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七)

(解放军)
胡居成

向敌后进军

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给项英回电:“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项英接电后,和叶挺、袁国平、张云逸等商量再三,终于作出决定:委托陈毅先组织一个先遣支队,出南陵深入江南敌后进入战略侦察。其实,3天前的那个夜晚,项英提出派先遣支队后,陈毅就开始筹备了。他挑选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担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支队一团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担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连,由一、二、三支队的侦察连组成,大多数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老战士。每连配备两挺机枪,一部电台,一个短枪排,全支队近500人。

4月28日,先遣支队在岩寺港口大祠堂门前排列整齐,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各支队领导人都前来欢送。叶挺讲道:“战友们,你们是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你们要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打开新局面!要用刺刀和热血,杀出新四军的威风来!”接着,由陈毅代表军分会讲话。他说:4年前那支“抗日先遣队”为什么失败了?根本的问题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不正确。今天,我们这支先遣队人数虽少,枪也破,可有党的正确领导,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陈毅从大局上分析了江南的形势和重要性,指出我们靠3条进江南:一是模范的群众纪律;二是广泛的统一战线;三是多打胜仗。

陈毅讲完话,几位领导人和先遣支队指战员一一握手。项英的表情很激动,他觉得有些难舍难分:他们此去,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民党百万大军都无法坚守的江南啊!他们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防区和日军的封锁线吗?到了江南平原水网地区能有效地开展战略侦察吗?……

送走了先遣支队,项英立即拟稿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等,电文的口气很凝重,开

头就说:“总部(指国民党第三战区总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电和屡次命令强迫执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指叶挺)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目前事已如此,只有以最坚强的意志和耐心,采取最妥善的战术和机巧的运用,时时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利用各种方法,争取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以便我军发展的有利前途。”接着,项英提出了以小部动作开展游击战、在最优良的条件集中力量消灭劣势敌人、创造基点构成游击网等7条战术原则。在电文的最后一段项英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军部准备移南陵。”

项英的电报发出5天之后,毛泽东于5月4日给项英复电,做他的思想工作:“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对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作了比2月15日给项英、陈毅的电报更加明确的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苏北地区。”

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给长江局、东南分局和项英来电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做思想工作,加上先遣支队顺利通过国民党川军第50军防区南陵和日军的封锁线宣芜铁路,进入苏南的第一个县高淳,项英的顾虑已有很大的缓解。遵照毛泽东5月4日电报“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的指示。5月中旬,第二、第三支队离开岩寺。第一支队分两部东进,一部向当涂、小丹阳两侧山地进发,一部去芜湖、当涂以东的河网地区。按照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政府协商所定,第三支队和军部留在皖南抗击日军。5月7日,军部离开岩寺移住太平县,26日,又移住南陵县土塘村。第三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之后,于7月进入皖南前线作战地区。

6月2日,项英与张云逸一起,由太平县军部去屯溪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过去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及第三战区交涉事宜,项英都委托叶挺去办。自蒋介石令新四军出南陵去茅山,叶挺认为“无甚理由拒绝”,项英就对叶挺产生了不信任感,认为“蒋介石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新四军的活动区域狭小问题经叶挺多次交涉,未获明显效果后,项英决定亲自出马去与顾祝同谈判。

顾祝同对项英很热情,谈判取得一些成果。6月4日,项英给毛泽东、王明、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兴奋地说:“对于我活动地区已较前划大,丹阳湖至当涂、芜湖一带和溧水、天王寺之东金坛、武进、江阴一带均划归本军,并将荡汾附近至东北渡之交通线及其以西地区,经交涉后亦划给我们。同时,允许我军在宣城以东选择一条交通线。”项英在电报中还向党中央和长江局传达顾祝同投来的友好信息:“希望此间能如中央双方首脑一样共同努力,许多问题不必到中央解决,他可协商讨论,并要我们经常与他建立关系或通讯。”

活动区域扩大,第一、二、三支队顺利进入抗日阵地,先遣支队破坏敌铁路成功,使项英对深入敌后抗日信心大增。6月15日,他在向毛泽东、王明、周恩来等报告第一、二、三支队部署和任务的电报中,雄心勃勃地说:“如战况一时无大变化,准备组织野战司令部,到茅麓一带指挥一、二支队,由我去任指挥。”

6月23日,项英给陈毅写了一封六千余言的长信,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建设、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政权建设、扩大部队等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战略战术上项英提出:目前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以伏击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取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进一步消灭较大的进

攻之敌,以达到逼敌人退守城市,造成江南进攻的形势。

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上项英提出:胜利是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建立根据地是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苏南以茅山、瓦屋山等为根据地,在镇江、句容、丹阳山等地建立基点,向四周游击;另组织几个挺进队,向南京、武进、常熟、无锡、金坛游击挺进。我们计划在皖南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政权建设上项英主张:恢复政权,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凡是我军所到之处及基点根据地,均应恢复保甲组织,但均需经过上级政权批准或委任。至于县政权,如有的可以促其改进,否则选择贤明之士组织临时县府,呈报顾祝同加委或选派。如若政权在同情我们的人手里,甚至有党员更好,这对于我们有较大利益,对于伪政权应把它摧毁,建立我国政权。

对于扩大部队,项英提出:目前第一步主要不是积极扩大本身,而是争取地方武装,以造成部队扩大的基础。

另外,项英对建立地方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政治宣传、对国民党地方党部、改造地方武装等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项英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后期借故迟迟不愿北移,坚持“独立开展南方局面”的雏形纲领。

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向敌后进军的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4月初由霍山县流波疃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准备战场,对敌作战。

5月12日,四支队九团得悉日军第六师团板井支队巢县守备队到县城东南十余里的蒋家河口抢掠骚扰,便由副团长顾士多、二营营长黄仁庭率领侦察队和一个排前往伏击。上午8时,日军20余人乘船登岸,战士们出敌不意,以密集火力将敌杀伤过半,残敌企图抢船逃跑,战士们又以手榴弹将船炸沉,仅20分钟,全歼这股日军。我无一伤亡。这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次战斗,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5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成立鄂豫皖省委,开展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和江淮之间广大地区抗日斗争,使四支队成为这一区抗战主力。四支队即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对日军频频出击,仗仗都有可观的战果,在敌后起到了震慑敌人、振奋民心、扩大新四军影响、鼓舞抗日斗争的重大作用。

(责编 启元)